

孫中山傳

宋庆龄題

尚明軒著

北京出版社

孫中山傳

宋庆龄題

尚明軒著

北京出版社

庚申忆逝

张稼夫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4.625 字数：88千字

1984年4月第1版 1984年5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

书号：3088·401 定价：0.56元

前 言

自从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大力进行了拨乱反正的工作，到六中全会已大见成效，许多被混淆了的是非曲直问题，得到了纠正，保证了我们党能够继续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前进。这是一项关系到我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成败的大事，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是应当大书特书的。在十年动乱期间，被混淆了的事物，既有现实问题，也有历史问题，既有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也有个人的功过毁誉问题。我亲身体会到坚持实事求是，既需要理论、见识，也需要勇气、胆量。在“文化大革命”中别有用心的歪曲事实者不乏其人，无知和幼稚的受骗者也为众多。对于后一种情况，可以谅解，然而谅解不能帮助受骗者觉悟过来。这个情况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使后来者了解革命前辈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从中汲取教益，少走弯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经历至今萦绕在心头。一批又一批的外调者使得我应接不暇，写了许多证明材料。诸如，山西的青年抗敌决死队，国民兵军官教导团，战地动员委员会，十二月事变，民族革命大学等许多

问题，竟然成了糊涂帐，都来调查。其实，那是我们党在山西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产物，局外人是难以理解的。例如：仅仅为了一个山西的牺牲救国同盟会的问题，外调者问：牺盟会是不是反革命组织？我回答：不是反革命组织，而是革命组织。外调者又问：牺盟会的会长是不是阎锡山？我回答：不错，阎锡山是会长。我的这种回答，不要说红卫兵听了要吃惊，就是不了解山西情况的参加革命较晚的干部也不易理解；反革命头子居然是一个革命组织的领导人，这真是不可思议！但是，历史事实确是如此，不能改变。为此，我对外调者，不得不仔细地介绍抗日战争时期山西的形势、特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牺盟会以及其他组织的产生及其发展的历史，还要特别地反复地说清楚，阎锡山只是名义上的会长，实际主持工作的人则是共产党员薄一波、牛荫冠等同志，从上层到基层大部或者基本上是共产党员掌握了实际领导权，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绝大部分外调者听了我的介绍，看了我写的证明材料，是满意的；有的甚至说，好象上了一堂政治历史课，气冲冲而来，欣欣然而去。与此同时，我又被迫交待我的历史，这就使我对于走过的道路作了一番又一番的回顾；本已模糊的某些历史情况，经过回忆，又历历在目。而那些历史情况又正是目前的年轻一代所不了解的。由此，我就想到，应当向新的一代介绍革命斗争的历史，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前两年，出于一种阶级友谊和政治责任感，我写了怀念林枫同志的文章。有些同

志看了文章以后，劝我把个人的经历，特别是从太原失陷到晋西事变的这一段经历也能忆述一下。因为从领导角度能够讲述清楚这段情况的人，已经为数不多了，并且通过个人的经历把当时党的工作的某个侧面反映出来，是有意义的。于是，由于这些同志和现代史研究所同志的一再鼓励，我就不揣浅陋，写上几页，聊胜于无吧。

我接触马克思主义较早，“五四”时期就开始阅读马克思著作，但是直到一九二七年才参加中国共产党，其原因是我少年时期形成的固执性格所致。我不理解的我不信仰，我追求的是透彻的理解，我想，脑袋长在自己肩膀上，要自己去思考，不应盲从。这在实际上也发生了一个标准问题，即自以为理解的，正确的，并不一定都是真理，这需要实践的检验；不过我的性格还有另一个方面，那就是我对我已经选择的信仰——马克思主义，从不动摇。我对党是忠诚的，即使在我和党失去联系的时候，或者在我们党的事业遭受挫折的时候，也决不动摇。我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这大概也就是我可以向读者提供的一点礼物了。

我写这篇材料的本意是想总结一下我自己所走过的道路。哪些作对了，哪些作错了，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加以叙述和总结；不文过饰非，不隐恶扬善，不为自己树碑立传。待这个材料写完，又感到没有多少可取的经验，深感抱愧。在写作过程中，从童年写起，是为了说明我的性格形成的过程，以及当时的社会环境。在写作的方

法上，只写我经历的事物，听来的事物不写，有些非写不足以说明问题时，也要少写。我不越俎代庖，甚至掠人之美。因此，从一个地区的工作情况来看，我写的这份材料可能不连贯，不全面，那也只好宁付阙如，也不强不知以为知了。

我是在前年（一九八〇年·庚申年）开始写了个提纲，打了个腹稿。所以就把题目定名为《庚申忆逝》。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中共山西省委、太原市委、中国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李新、聂元素同志和有关的一些同志的鼓励和支持。我的写作过程是这样的：一九八一年六月我去到太原，向山西省文联借调了李束为同志，向太原市委宣传部借调了黄征同志，首先由我口述录音，再由黄征同志整理成文字资料，最后由李束为同志加工写成为本文的征求意见稿。在初稿打印以后，许多同志又提出修改意见，有的同志还提供补充材料。今春我又根据这些同志的意见，请黄征同志来京，帮助我在中央档案馆和北京图书馆查阅了若干必要的档案、文件和报纸。力求本文所述往事的时间、地点和情况，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校正我自己记忆中的失误之处。今年五月，我得到云南省委的同意，约请李束为、黄征同志来到昆明，把这个稿子最后修订了一遍。在修改的过程中，有一些地方在文字上，曾经过王修同志的加工。所以我的这篇文章的写成，既包含了李束为和黄征同志的大量心血，也得到了中共山西省委、云南省委和以上所有同志的支持、鼓励和协助，在此谨向他

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在这一修订稿写完以后，我自己为了慎重起见，将全稿从头至尾，又认真地审阅了一遍。当我读到第十四段我将离开晋西北去延安时，想在后边再增加一点，将我自从一九二七年四月入党以来，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由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的学习和锻炼的过程，回顾和总结一下。未料我这一写，就停不下笔来；当我写到若干“以身作则”地对我进行过党性修养教育的同志，特别是写到抗日以后和我相处最久的林枫同志时，于是我就不得不写长了许多。因此，我自己就决定将它另行列为一段，便成为这一稿中的第十五段。

张稼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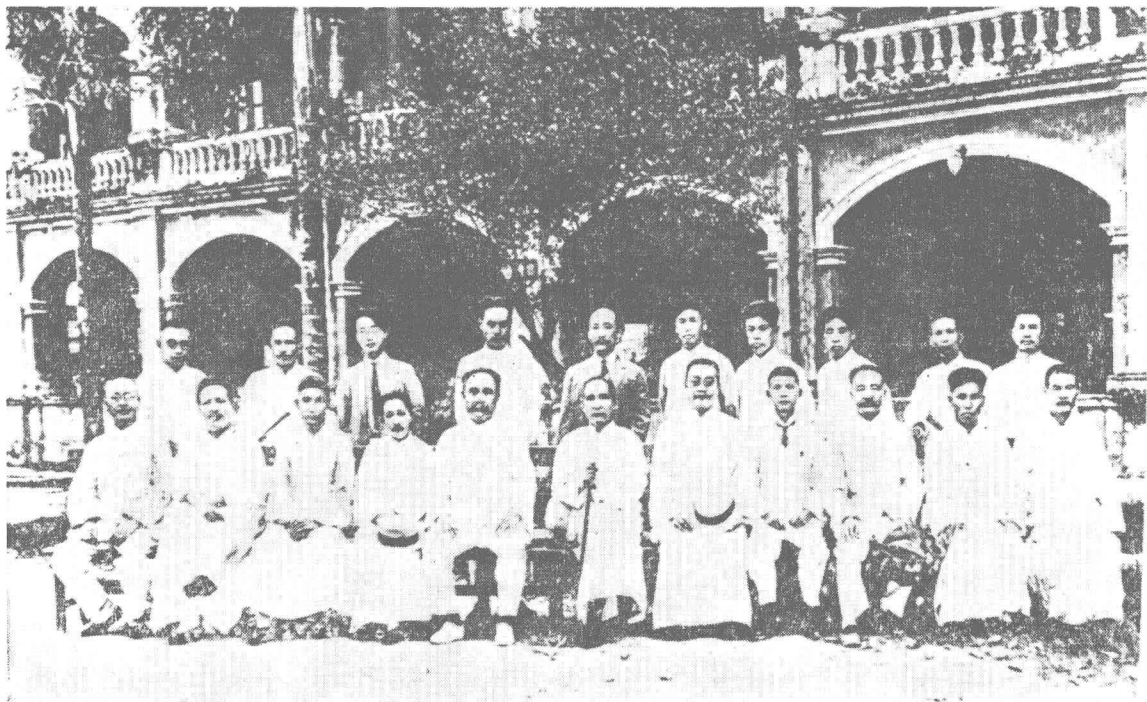
一九八二年七月于昆明



一九一六年四月在日本集会声讨袁世凯
(后排左起第二人为廖仲恺，前排左起第四人为宋庆龄，第六人为何香凝，第二人为廖梦醒。孙中山前面的为廖承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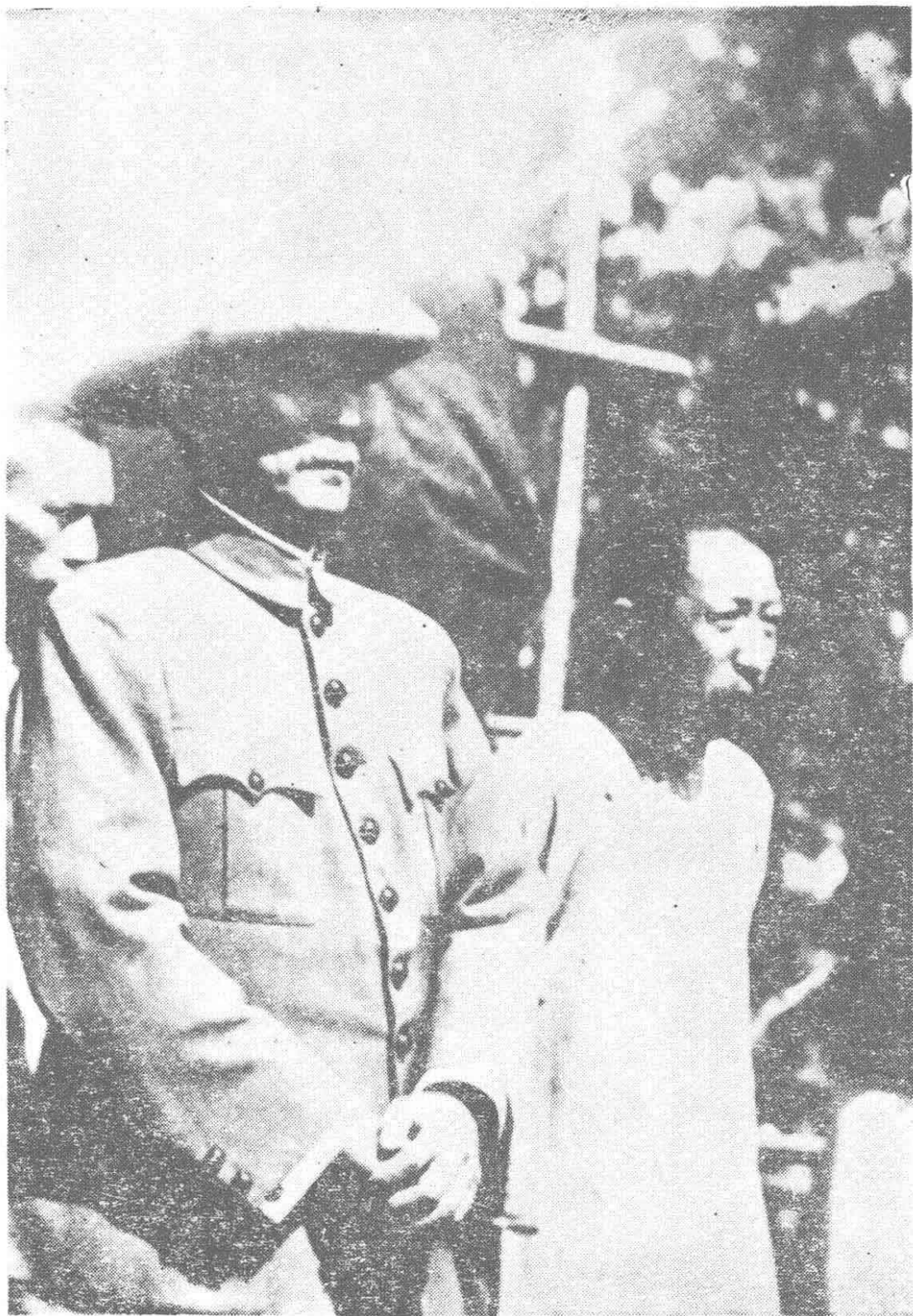
一九一七年九月在广州就任护法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
(前排正中为孙中山)



一九二四年一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与部分代表合影
(前排正中为孙中山。后排左起第三人为瞿秋白。)



一九二四年一月与李大钊（左一）步出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



一九二四年和廖仲愷在广州庆祝十月
社会主义革命七周年大会上



一九二四年与宋庆龄在广州岭南大学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经日本北上至天津
时与宋庆龄在船上



北京香山碧云寺孙中山纪念堂外景



南京紫金山中山陵

僕姓孫名文字載之號逸仙籍隸廣東
廣州府香山縣生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華
歷十月十六日幼讀儒書十二歲畢經業
十三歲隨母往夏威夷島始見輪舟之奇
滄海之闊自是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
想是年母復回華文遂留島依兄入英監

手迹之一：《自傳》的一頁